

城市更新视域下大明宫遗址区空间生产实践检讨及优化策略研究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Research of Daming Palace Ruins Area Space in the Urban Renewal Horizon

王新文^{1,2} / WANG Xinwen, 张沛¹ / ZHANG Pei, 张中华^{1,3} / ZHANG Zhonghua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建筑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城乡规划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陕西 西安, 710055; 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风景园林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城市中大遗址所在区域往往人居环境脏乱,通过城市更新生产新的空间,既要关注其物质环境的改善效果,更要分析其空间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化现象、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以及空间生产中社会关系的重建等问题。大明宫遗址区域城市更新是在政府、资本与文化的共同推动下完成的,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调整了地方政府之间以及遗址区公众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建议进一步加强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促进空间正义以优化空间生产。

【关键词】城市更新;大明宫遗址;空间生产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The big ruins areas in city are often dirty and mass, through updating production new urban space, we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effect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analyze its capitalization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space producti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space produc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ace in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other issues. Daming palace ruins area is finished with the help of government, capital and culture promoted, an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enewal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site area public social relations are adjusted.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promote the spatial justice to optimize production.

【Keywords】Urban Renewal;Daming Palace Site;Space Production

由于城市空间环境的物质性,其所经历的形成、演化、更新之过程,反映了城市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的功能。物质环境更新是城市获得发展动力,适应新时代要求以避免衰退的重要方面。然而,大规模城市更新带来的往往是城市景观的趋同,这是由于更新的实施者较少关注地方文化积淀,从经济利益出发的物质更新往往以时尚及现代化的表征取代历史文化的传承,导致千百年所形成的人文环境被瓦解。1980年代以来,伴随消费经济的兴起,世界各国纷纷提出历史文化保护为核心的城市复兴计划,推动了文化导向下的旧城有机更新。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开发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下由新城新区开发转入城市旧区挖潜再造,然而城市物质环境更新并不意味着城市可以就此获得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事实上,与城市物质环境更新相伴的往往也是空间社会关系的重组以及生产关系的重构。在后工业时代,以文化资本引导城市更新,通过文化资源激发空间活力,对于城市空间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处于城市之中的大遗址数量众多,其保护工作与区域发展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大明宫遗址区域空间生产进行分析具有较强的理论借鉴意义。

1. 大遗址区域城市更新中的价值取向

1.1 城市更新的价值取向

城市更新是为了实现城市发展权利,体现城市更新实施者的价值观的一种社会活动。在人类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

往往面临着不同的发展语境和城市问题。由此人们建构了不同的城市权利观,从理性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而至充满人文色彩的文化权利和生态权利,反映了人们对城市价值认识的不断发展。然而,在当代中国,全球化与时空压缩所带来的城市发展阶段的叠合,使得城市更新所要面对的不是单一的人居环境更新问题,而是更为复杂、更为系统的社会问题。城市更新的价值取向就不仅是物质环境的更新、人居生态的改善,而且也涉及到区域社会关系的重建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公众对城市更新往往抱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人们希望通过大规模的物质环境更新达到人居环境改善的目的;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大规模物质更新又有所犹疑,担心祖辈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就此而分崩瓦解。对于政府来说,城市更新往往意味着大规模的投入,因此,政府希望通过招商引资的形式,对急需更新的城市旧区予以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并尽可能实现经济平衡,以此达到创造政绩的目的。而开发商关注的重点往往仅是开发中所带来的短期经济效益。显然对于城市更新中利益相关者来说,城市更新的价值认识并不一致。

1.2 文化资本:大遗址区城市更新价值共识的关键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区域来说,社会各界对城市更新价值的认识往往更为复杂。一方面,虽然公众与遗产为伴,然而长期以来囿于遗产保护政策往往导致居住环境得不到合适的改善,因而,在城市更新中公众并不了解遗产保护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并未将遗产与地方认同感和文化价值相联系,人们关注的仍然是获得合理的拆迁补偿等经济利益。对于政府来说,

遗址区城市更新不仅是民生环境的改善,更是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发展,显然其价值目标更为多元;另一方面,城市更新、特别是遗产保护的巨大投入使得更新的主导者与实施者往往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在城市更新中不得不考虑经济平衡等问题,为此采取对遗址区民众进行异地安置的政策,这往往导致了空间社会结构的重组。

文化资本概念是在历史遗产区城市更新过程中各方主体价值趋于一致性的关键^[1]。这是由于在大遗址区域进行的城市更新中,各方通过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创造性的利用,激活了遗产内涵的文化创造力,从而在随之而来的新空间生产中获得资本增值。这就在一定意义上,使参与城市更新的各方在价值取向上取得共识。当然,文化遗产经济活力的资本化与城市更新的决策者、实施者自身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整合能力相关,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所掌握的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资本越多,通过这些文化资本能给更新后的城市带来的文化、经济、社会效益就越多。

1.3 文化导向下的空间生产——“曲江模式”

哈维指出“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一种建构环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本身的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2]”。每一种生产关系都会产生相适应的空间关系,在城市更新以商业利益为目的背景下,城市空间生产往往表现为试图运用资本力量将所有城市元素都异化为商品,生产出异质空间,也就是空间的资本化,从而获取资本收益。在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文化消费促成了人们对城市的新理解,对城市发展也有了新期待,西安曲江新区所在区域拥有大量文化遗存,由于其会对旅游产生较强的吸引力而对区域发展具有经济潜力。曲江新区在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文化的价值,通过对文化资源价值的再认识,完成文化要素的有机整合,从而生成具有鲜明唐文化形象的符号空间,有人将其概括为“文化+旅游+城市”的曲江模式^[3]。它“建构了新的城市空间关系,形成了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动力、文化风貌和文化亮点。西安的这些新空间生产形式,直接构成了城市建设的新的动力源泉,也促进了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城市空间形态的形成^[4]”。当然,由于“文化、历史和艺术这些联结了城市符号生产的多样要素被快速商品化或商业化,也可能使城市失去了地域特色标记^[5]”。这就要求文化导向下的空间生产要高度重视保护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2. 大明宫遗址区空间生产实践评析

当代西安是一座建设于遗产之上的城市,遍布全域的大遗址是城市文化的精髓。然而,城市局部空间环境往往因大遗址保护的局限性而成为无序发展的牺牲品。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在遗址整体保护的基础上,对遗址周边进行更新改造对于优化城市发展格局、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推动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面对遗址区密集的人口和大量的建筑物,其空间生产的动力及方式直接影响城市更新的效果。

2.1 遗址区物质环境更新

大明宫遗址位于今天西安明城墙和北二环之间,正处于城市快速发展的区域。近代以来,大明宫遗址区随着陇海线的开通而逐渐形成聚落,20世纪30年代,大量河南难民聚居于此,逐渐成为西安城北一处人口集中的城中村。20世纪90年代以后,

伴随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被动保护的大明宫遗址区除遗址核心部位没有建设,周边均已为建筑物所覆盖,此外还有一些农田及部分仓储设施和市场用房。这就造成了城中村分布密集,新区与旧区混杂的脏乱差人居环境。对于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工作来说,要想让遗址重新获得尊严,为后续的考古及保护工作服务,必须将叠压在遗址上的建筑物全部清理。当然,不仅遗址本体需要通过拆迁来获得良好的保护条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城市各部分之间有着密切的空间联系,必须综合考虑遗址周边区域的城市更新,才能激发遗产自身的文化活力,发挥遗产对于城市的功能。遵循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基本原则,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更新物质与功能均已衰败的遗址区城市区域,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正如E.沙里宁(E.Sarinen)所说:“城市能否免于毁灭取决于一个特别却基本的问题是否可能被解决:提供舒适的设施和健康的环境来供人们工作和生活。^[2]”

2006年,为保护大明宫遗址,同时推动遗址区城市发展,西安市决定由曲江新区主导,对大明宫遗址区19.16km²实施有机更新^①。在遗址核心区域城中村整体拆迁之后,基于真实性的保护要求,遗址被整体保护建设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几年来,政府通过对遗址周边区域的土地整理、功能置换和环境整治等措施逐渐调整与遗址区功能定位不符的用地类型,增加与之功能相配套的设施用地,改善人居环境,调整开发强度,合理配置商业、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结合居住区绿地设置供居民休闲娱乐的室外活动场地,创造优美的居住环境。城市更新中完善了遗址区市政基础设施,完善了区域路网,提升了区域交通承载能力,遗址区城市物质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

2.2 遗址区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

人们曾视空间为容器,然而,随着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发展,空间被认为是产品,是被有意识建构的产物,空间逻辑从属于政治与经济的逻辑^[7]。包亚明认为资本与政府共同造就了上海衡山路酒吧街^[8]。马秋穗则视古镇景观生产为一种“发明的传统”,隐藏着政府机构和公司、文化精英和大众等多重关系的合力^[9]。在当前阶段,我国城市更新突出表现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方面,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有强烈的经济发展愿望,通过行政规制、土地批租、地方税收、地方举债等诸多“地域内权力”有效地左右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成为“增长型政府”。另一方面,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结构也使得地方政府往往对于一般居民有着较强的动员能力与动员机制^[10]。使其在实施城市运营中更加广泛而有力。

大明宫遗址区的更新改造体现了政府与资本的结合。一方面西安市政府设立了代表其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发挥政府作用的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办公室;另一方面,成立了按照市场原则行使城市开发与运营职能的西安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项目建设、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管理。这样就形成了政府主导、资本推动、以文旅及地产推动城市更新,进而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模式。在此,政府充当了开发和管理双重角色,政治权力及其资本配置成为主要推动力量。由于出资方是政府控股的企业,使其在遗址区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形成了与西方类似的“城市增长联盟”。政府利用行政资源为资本在空间实践预留机会空间,使资本能够产生最大的空间价值,这种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动力机制极大地推动了空间的生产能力。

此外,由于大遗址的文化价值日益为人们所认识,文化成

为空间生产中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大明宫遗址保护过程中，曲江新区代表政府履行遗址区城市更新管理及运营的职责，其所擅长的文化整合能力为大明宫遗址区城市空间生产增加了文化的维度，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成为整个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形成了一种文化导向下的空间生产实践。总体来看，在大明宫遗址区城市更新中政府、资本及文化共同构成了空间生产的动力。

2.3 以塑造文化空间为核心的空间资本化过程

城市中的大遗址区域往往因保护政策的局限而成为物质环境衰败的区域，基于对遗产文化价值的全面评价，遗址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改善遗址区环境，还遗址以尊严，通过环境整治营造适合遗址保护及遗址区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环境。

随着文化遗产社会价值认识的发展，对大遗址的展示利用以及由此而发展的旅游事业是文化遗产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功能。在遗址区所进行的城市更新以及随之而来的空间生产中，生成新的文化空间是文化资源资本化的基础，也是整个遗址区空间生产的起点。文化空间是以遗址保护为核心，以文化旅游为导向，通过文化符号的设计与布置，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激活遗址文化内涵，从而达成注重体验性与文化性的消费空间。文化空间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圈层结构特点，其核心区域为遗产保护与展示利用区，由于大遗址往往“一无所有”，无法传达给人有效的历史文化信息，同时，遗址所具有的场所精神揭示了人们和遗址的情感联系，通过形象化的遗址展示设计可以传播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揭示远离公众日常生活经验的文化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遗址核心区域成为文化符号建构的空间。文化空间生成的过程也是考古遗址彰显“地方性”，形塑人们对于历史沧桑记忆“地方感”过程^[3]。在遗址展示区之外是相关文化旅游服务设施区，承担了文化旅游发展的支撑作用。在文化空间生产过程中，资本注重对地方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大明宫遗址保护与更新中，不仅遗址得到了科学保护，而且遗址区工业厂房等设施也成为文化空间生产的重要资源，人们通过保护、更新、重建等手段营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物质环境，为文化产业提供了空间条件。

哈维认为，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一种建构环境，其生产与创建是资本控制和作用的结果，资本本身的发展必然要求按照自己的设想创造一种物质景观^[12]。政府通过对大明宫遗址核心区域的保护与展示将其打造为一个可意象性的文化空间，激发了人们对于该空间的认知、想象与憧憬，从而推动了资本对周边区域的注入，将其周边区域塑造为一个能够满足人们空间喜好、并承担多种城市功能的空间。这就推动了遗址区的产业转型、价值链再造，由此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将生产出一系列新的生产空间、消费空间、居住空间、生活空间、游憩空间，等等。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空间不仅是生产的结果，本身也成为消费的对象，成为城市更新中资本获得回报的产品。在空间形态上，遗址周边区域往往采用高强度开发的策略，与核心区遗址共同构成了中间低、四周高的碗状空间形态。这是由于遗址核心区域在城市更新中因其遗产保护的要求被定位为公共文化空间，从而使其退出了土地市场流通领域，资本为了获得经济平衡不得不采取提高周边开发强度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也是一个空间资本化的过程。

2.4 遗址区社会结构重组

在城市更新中，由于物质空间的再生产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秩序，导致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居民的价值、

态度和行为也被随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这就改变了原来旧的社会关系，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空间^[13]。大明宫遗址区伴随城市更新而来的空间生产引起的社会变化，首先表现为管理和组织机构关系的重组。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范围跨越未央区、新城区、莲湖区三个行政管辖区域。一个新的物质空间的产生，必定会形成新的权力机构来对其实行管治，这时就会产生新的政府，或是政府派出机构^[13]。主导遗址区保护改造工作的是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办公室，该机构全面负责大明宫遗址区的保护改造工作，享有发展改革、招商引资、规划建设等市级管理职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将遗址区三个区级政府所拥有的部分管理权限让渡到改造办，政府间的权力秩序发生了一定变化，随着空间生产强度的加大，新机构与原来政府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增加，需要处理好新旧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

其次，空间生产还调整了遗址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随着大明宫遗址区棚户区的拆迁，原来以居住功能为主，使用者以河南移民为主，内向的、城市边缘社区，逐渐转为居住、商业、文化产业等多功能综合的新城市中心，使用者也逐渐转为城市高端人群为主，兼有部分原住民的新区。特别是，随着空间交通设施的完善以及遗址公园的建成开放，整个遗址区域成为公共的、开放的人际交往空间。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由原来的“熟人社会”快速演变为以消费为特点的陌生人社会。可见，新空间生产是对人们既有社会关系网络的一次重大冲击，破坏了人与土地之间长期形成的地方情感依恋，显然，这也成为地方文化的重大损失。

2.5 遗址区产业结构重组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的城市更新是解决日益紧张的人地矛盾的必然途径，通过改造城市物理环境，为参与更新的资本创造更多的资本增值是空间生产的重要目标。因而，与物质空间生产相伴随的往往是经济关系的变化。随着大明宫遗址区城市更新的展开，原有仓储物流等低端产业逐渐退出。与新物质空间环境及新社会阶层相适应的大型商业综合体、旅游服务商业陆续进入，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区域产业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大华 1935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项目对于提高区域文化创意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使得整个区域的文化特色更加突出，丰富了区域商业类型的同时，也为区域未来商业结构的完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多样的文化旅游项目及丰富的业态必将吸引来自不同地域的个体汇聚于此，从而生产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

3. 大明宫遗址区空间生产优化策略

3.1 真实保护历史遗产，创造差异性空间

城市更新是参与实施的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空间实践行为，资本沿着自己惯有的生产逻辑，试图将一切价值都简化为抽象的交换价值。资本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也在不断重组原有的空间分配关系，个人被安置在空间秩序的特定位置。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为资本与媒体合力营造的现代消费体制所控制，日常生活的丰富性与差异性为资本的同质化所吞噬，空间元素转变为可以交易的商品，空间变得均质化。这样的空间生产给资本带来了利润，但消解了个人生活经验的丰富性。为了恢复个人日常生活多元的生活体验，让人成为与土地有精神情感联系的、日常的人，地方的人，必须创造“差异性空间”。与现代化、均质化的符号表征景观相比，生成于不同时间段的

遗产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多样的日常生活体验,那些老房子、旧家具、旧机器、斑驳的土墙、高敞的工业厂房,甚至地面一无所有的大型土遗址都是我们与过去相联系的记忆资源。

在大明宫遗址区所进行的城市更新中,曲江新区是空间生产的主导者,这就使得大明宫遗址保护与周边区域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曲江的空间生产路径。然而,曲江模式中文化是一种浅表层次的文化,是一种可消费的文化,依托故事进行空间景观的生产,这就使其生产的空间景观具有了可复制性。随着曲江经验的输出,城市生活的丰富性日益为单一所消解,遗址区人们对曾经生活的地域日益陌生化,新空间生产割断了人们与原有文化的联系。作为世界遗产的大明宫遗址在考古公园建设的过程中,注重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较好地保持了历史遗产的真实面貌。然而,大明宫遗址所在区域并非仅有盛唐的历史,也有着近现代的演变。因此,在大明宫遗址区域的城市更新应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梳理、价值研究、提出相应的保护利用策略,将大明宫遗址区打造成为一个有着丰富人文体验的差异性空间,不仅与现代都市有着鲜明的不同,而且与曲江的盛唐文化意向有所差别的空间。

3.2 鼓励公众参与、关注空间正义

在当代中国,政府在城市更新中具有核心地位,其所采取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空间生产的走向与结果。从大明宫遗址区域空间生产机制来看,由于政府与开发企业之间所形成的“增长联盟”关系,这就保证了空间生产的效率,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然而,出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开发企业往往可能导致过度的空间生产,不注意人的使用感受,过度建设脱离人们实际需要的消费场所与设施;或是将原居民分散迁居,这就使人们的居住空间分化与碎片化。事实上,也就侵害了公众平等使用空间的权益。因而,政府或其代理机构要切实发挥引导作用,防止资本对空间的霸占。

当前,人们的个体意识在不断增强,在遗址地空间生产过程中,对于相关利益群体意见的倾听与采纳有助于空间生产中人地情感的重建。通过鼓励居民参与空间生产,将最大限度地减少遗址区社会关系的震荡,当然这也是空间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为此,要在遗址区城市更新中建立公众参与与规划的制度保障,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协助公众组织参与政府决策,提升公众的参与能力。

4. 结语

大明宫遗址区进行的城市更新是政府、资本、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样的空间生产过程中,随着文化空间的形成,资本大量注入,引发了土地价值的增值,空间成为资本的生产

对象。新的空间生产涉及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调整,也使得遗址区社会关系发生了调整。针对大明宫遗址区空间生产实践,建议保护遗产真实性,创造差异性空间;鼓励公众参与,关注空间正义。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地点理论研究”(16FJY013)。

【注释】

① 2007年,西安市通过的《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遗址区面积为19.16km²。

【参考文献】

- [1] 黄怡,吴长福,谢振宇.城市更新中地方文化资本的激活——以山东省滕州市接管巷历史街区更新改造规划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5,(02):110-118.
- [2] 张应祥,蔡禾.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述评[J].学术研究,2006,(03):85-89.
- [3] 王云岭.曲江模式: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案例[J].中国经贸导刊,2010,(02):69.
- [4] 陈宇飞.西安城市文化“形”、“神”、“义”的大融合——读《一座城市的文化穿越——西安曲江模式》[J].西安社会科学,2011,(06):6-8.
- [5] 褚冬竹,严萌.城市更新“退型进化”现象、机制与前瞻[J].建筑学报,2016,(07):11-16.
- [6] 朴松爱,樊友猛.文化空间理论与大遗址旅游资源保护开发——以曲阜片区大遗址为例[J].旅游学刊,2012,(4):39-47.
- [7]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1991.
- [8] 包亚明,王宏图,朱生坚,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84.
- [9] 马秋穗.符号想像与表征:消费理论视阈下的古镇景观生产[J].社会科学家,2010,(10):85-87,94.
- [10] 张振华.增长联盟:分析转型时期我地方政府经济利益集团关系的一种视角[J].天津社会科学,2011,(01):72-77.
- [11] 张中华,段瀚.基于Amos的环境地方性与游客地方感之间的关系机理分析——以西安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J].旅游科学,2014,(08):81-94.
- [12] 李和平,惠小明.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英国城市更新历程及其启示——走向“包容性增长”[J].城市发展研究,2014,(05):85-90.
- [13] 刘珊,吕拉昌,黄茹,林康子.城市空间生产的嬗变——从空间生产到关系生产[J].城市发展研究,2013,(09):42-46.

【作者简介】

王新文(1974-),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规划理论。